

1611

許昌文史資料

第二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许昌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许昌文史资料

第20辑

政协河南省

许昌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6年10月

主 编 陈书壮

封面题字 赵士生

许昌文史资料

第20辑

编 辑：政协许昌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 刷：许昌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文印中心

开 本：1/32大

印 张：7.5

印 数：2000册

豫内资许新出通字（2006）A012号

内部交流

主 编:陈书壮

编 委:(以姓名笔划为序)

王中禄 刘文忠 刘永信

刘自明 刘德记 杨付根

陈书壮 周 健 彭道良

谢玉好

编 辑:王小宇

目 录

怀念母亲李建彤·····	刘米拉 刘都都 刘索拉(1)
一次难忘的教诲·····	梁建都(16)
贺升平自传实录·····	芦应强(19)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铁岗·····	刘思明(31)
战功卓著李富荣·····	刘林德(47)
悬壶济世 救死扶伤·····	卢明仁(62)
许昌曲艺史略·····	贾凤翔(79)
越调与毛爱莲·····	马炎心(87)
许昌豫剧史话·····	李季安(102)
《人欢马叫》等剧目的创作和演出·····	李树修(111)
“倒霉大婶”汤玉英·····	向茜楠(116)
政协许昌市第四届委员会优秀提案选辑(四)	
·····	王同仁 张运昌(推荐)(125)
白沙“战役”目击记·····	杨恒珊(142)
许昌社教亲历记·····	宋洪飞(147)
回忆我在西藏支边的岁月·····	田翠芝(153)
鄢陵乾明寺塔的由来与变迁·····	解丙言 崔夫德(171)

宋钧官窑,一座令人瞩目的历史高山	
.....	李争鸣 李少颖(173)
周定王陵印象记.....	汪 洋(181)
鄢陵花卉.....	解丙言(185)
药王与药都.....	铁绍文(191)
鄢陵陈氏.....	张彦甫(203)
“纳实·平原相陈元.....”残碑考 ...	黄留春 黄越(213)
恒得颜染坊.....	李太和(218)
许昌典故.....	郑国卿 方文亮 赵宏亮 董娥仙(2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许昌市第四届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230)

怀念母亲李建彤

刘米拉 刘都都 刘索拉

2005年2月14日,我们的母亲李建彤在北京病逝。现在,我们写下这篇文章,回顾母亲那坎坷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略表我们的绵绵长思。

1919年12月,母亲出生在河南许昌县椹涧乡坡胡村一陈姓人家。由于家境贫苦,加之陈家重男轻女,母亲刚出生便被其父母抛弃于一口水塘边。做小生意的李福顺路过水塘,看见寒风中嗷嗷待哺的婴儿,陡生恻隐之心,遂把婴儿抱回家中喂养。当时,李福顺夫妇尚未生育,对捡到的孩子视如己出,十分钟爱,起名“珍妮儿”。从此,李福顺就成了我们的姥爷。

没过几年,李福顺家的几个孩子相继出世,家中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母亲聪明活泼,深得其姑姑和姑夫韩鹤亭(时任建国豫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其籍贯今为汝州市,是樊钟秀的结拜兄弟)的喜爱。几经商量,姥爷和姥姥忍痛割爱,把我们的母亲过继给了她的姑姑,属韩、李两家共同的女儿,改姓韩,起名韩玉芝,但仍住在李家。

在正式上学前,家里人先把她送到私塾读了半年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老式启蒙教材。1927年夏,母亲考入了许昌县城内的党部街小学。

没过多久，母亲又转到许昌一小。这个学校很正规，教员大都是从开封女子师范毕业的，素质较高，有一定的教学水平。

1930年5月，在母亲上三年级时，蒋、阎、冯三派军阀的大混战——中原大战爆发了。学校被军队强占，老师和学生统统被赶回家去。为了不让母亲荒废学业，家里人又把她送到私塾里，念了大约一年时间，学完了《四书》、《五经》。

战争结束后，母亲转到县立女子小学，直接上五年级。她的班主任叫黄燮臣，教她们国文。黄是一位既有胆识又有学问的老先生，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把课本内容与历史故事、时政要闻结合起来讲。母亲最爱听黄先生讲课，学习十分用功。因此，她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黄先生十分喜爱和赏识她。

母亲没有上六年级，就直接考上了县里刚刚办起来的女子师范学校（相当于初中）。家里人十分高兴，认为母亲确实是块儿读书的料，因此决心继续供她一直读下去，希望她将来能有大的出息。

县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从开封请来的河南教育界的名流，教员也都是大学毕业生。在当时河南的中学中，许昌县女子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是较为雄厚的。更为难得的是，这所学校不为世风所动，始终坚持开明的办学方针。

母亲在这所学校里认真地读了三年的书。1935年夏，她以优异的成绩从该校毕业。在校期间，她连任了五届学生自治会主席（三年内共选了六届）。母亲既不是一个死用功、读死书的书呆子，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安于现状的人，而是在试图改造或改

变一些东西。因此，校方对她很是有些头疼。

三年中，对母亲各方面影响最大的，要算国文老师杜勋岑。杜老师毕业于河南大学，思想比较激进，在课堂上经常发表一些支持共产党抗日、谴责国民党误国的言论。他特别推崇鲁迅、陈独秀、徐志摩等人的作品，还向学生们推荐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这些对于母亲在思想上和文学修养上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在杜老师的帮助和支持下，母亲和几个同学一起办了一个名为《朝霞》的墙报，由母亲担任主编。她们的墙报办得激进且富有朝气，经常发表一些谴责国民党政府腐败、同情劳苦大众的文章，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和支持，学生们踊跃投稿。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许昌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母亲更是以许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的名义，组织学生们走上街头，表演自编的独角戏、双簧等节目，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亡。

二

在其姑父（也是继父）韩鹤亭的赞助下，母亲得以继续求学。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开封艺术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当时的河南是数一数二的艺术院校，教学条件好，教师素质高，曾培养出不少艺术人才。

1935年夏，母亲第一次来到开封城。当时，开封的大多数青

年知识分子都被日军的大炮震醒，纷纷走出禁锢着自己的象牙塔，投身于滚滚的抗日救亡大潮中，“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呼声直冲霄汉。母亲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进开封艺术师范学校的。进校后，她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大潮之中。

那时，开封喜爱文学和关心时事的青年们办了许多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山雨》、《海星》、《青春诗刊》、《平野》等。母亲也和几个同学办了一个名为《澎湃》的刊物，由她担任主编兼主笔。这个刊物办得很有战斗性，不仅在学校里引起轰动，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5年冬，北平（今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河南的学生集体卧轨，以此来声援北平学生的正义行动。母亲是这次声援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1936年春，母亲突然辍学，跟随她的姑父去了南京。她辍学的主要原因是，不满于当时河南的相对闭塞与守旧，想到南京、上海等比较开放的大城市见见世面，若能到上海学习音乐当然更好。

母亲的姑父在南京探望了一些故旧，把母亲安顿好以后，就离开了南京。母亲在南京住了大半年，她一边在女子青年会办的补习学校里学习英语和钢琴，一边给一个军官太太当家庭教师。

1937年初，母亲孤身一人从南京来到上海，分别报考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考试完后，她决定先回家等待通知。分别快一年了，她十分想念慈祥、善良的父母。

回到许昌后不久，母亲就收到了上述两个学校分别从上海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由于不了解这两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她决定到

上海以后再作选择。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她那一贯沉默寡言的母亲默默地为她收拾行装；她父亲话也不多，只是给了她一笔盘缠。她知道，父亲一个人要养活五六口人，弟妹们又都在上学，家里的生活并不宽裕，所以对父亲的这种无私支持，她心里既感动又不安。

到上海以后，经过反复比较，母亲最终选择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因为那里的学费比较便宜。

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的校址在法租界外的打浦桥，校长是徐朗西。该校共分为两个系，即图工系和图音系。母亲报考的是图音系，主修钢琴、声乐和油画。

刚到上海时，母亲碰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上的障碍。且不说日常的交流，就连老师讲课居然也用上海方言。一堂课下来，她可以说什么也没听懂，只好借同学的笔记来抄。经过一个多月的不懈努力，母亲基本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学习起来也比较自如了。

母亲经常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为那里有许多从河南来的老乡。从他们的口中，母亲听到了许多关于华北战场的消息。自北平失陷后，日军长驱直入，进逼山西，形势万分危急。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由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二〇师相继由陕西开赴山西，并在平型关、阳明堡等地连战连捷，消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用事实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士气。

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母亲越来越感觉到，此时此刻，在这种艺术的象牙塔里高谈阔论，简直就是一种耻辱、一种罪过。她再也

学不下去了，终于作出决定：走，去参加抗日斗争！可是，去哪儿呢？当时全国都在抗战，究竟哪里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去太原，去西安，去武汉，还是去延安？她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先回家看望父母，然后再作决定。

第一学期一结束，母亲便离开了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离开了有着浓郁艺术氛围的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她又一次辍学，带着满腔的报国热望回到了家乡。

三

回到许昌后，母亲先看望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从他们那里，母亲对许昌乃至河南的形势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但对自己今后何去何从，心中仍不十分明朗。然而，母亲的归来，却使许昌的教育界看到了一个机会，因为她毕竟是许昌到上海读书的第一人，不管学成与否，总是难得的人才。所以有好几位颇有名望的老先生出面挽留她，请她在许昌教书。

一时无处可去，暂时留下来教书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更何况还有老先生们的面子，于是母亲接受了许昌女子第一小学的聘请，担任艺术教员。她的薪酬是每月 25 块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除了留下几块钱做生活费外，她把其余的都交给自己的母亲留作家用，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在许昌女子第一小学教书期间，经同事的介绍，母亲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在党组织的授意下，在学校里开展抗日救

亡宣传活动。母亲从那些已上前线或是去了根据地的同学们寄来的材料里边，挑选出一部分内容生动、立意鲜明的题材，改编成各种形式的说唱节目，并指导学生们排练，然后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她的努力下，没过多久，许昌女子第一小学就成了许昌城里一支很有影响力的抗日救亡宣传队。

1937年冬，在中共许昌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下，母亲和她弟弟李震一起去了西安。临行前，她改名为李建彤。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排他们到中共中央在泾阳县安吴堡开办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为期一个月。学习的内容包括游击战争、民主运动、统一战线、妇女运动等，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能够在战争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政工干部。学习结束后，母亲被分配到洛川县，名义上是去教书，实际上是在中共洛川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进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夏，中共洛川县委考虑到母亲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遂立即通知她去延安，同时批准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

母亲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后，部里派人征求她的意见。经过一番考虑，母亲选择了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目的是想多学习一些军事知识和技能，将来好上阵杀敌。到抗大报到以后，她被编在第五大队（大队长何长工）第四中队的女生区队。

1939年初,抗大的毕业生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母亲也几次要求上战场,但都没有得到批准。中队的指导员找她谈话,准备推荐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但是,她一心只想为抗战多做一些实际工作,就婉言谢绝了。最后她去了抗大的卫生处,担任宣传干事。

在抗大卫生处工作了三个多月后,组织上还是把母亲安排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为期三个月。

1940年夏,母亲被调到陕北公学新成立的文工队(队长王亚凡,指导员苏一平兼党支部书记)。1940年12月5日,陕北公学文工队与关中七月剧团合并,更名为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1941年底,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更名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简称西工团)。

1942年初,母亲考入了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院长周扬)音乐系(主任吕骥)。她是学院的第五期学员,学制为三年。

在鲁艺的三年间,母亲经历了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抢救运动的全称是抢救失足者运动,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的康生一手策划和主抓的。这一运动株连甚广,危害极大,母亲也被牵连在内。直到1943年8月,党中央出面进行干预,这场闹剧才草草收场。此后,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给所有的受害者予以甄别,恢复名誉。

1944年4月,母亲提前从鲁艺毕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工作。当时,该俱乐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组织、联系各种演出活动,以及安排边区所属各县的机关、工厂、部队轮流观看演出。开始时,母亲主要负责歌舞和乐队。两个月后,她担任了俱乐部主任。

五

1945年上半年,经母亲主动要求,陕甘宁边区政府抽调她参加边区政府第三次民主选举的筹备工作,而负责这项工作的正是后来成为我们的父亲的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父亲在这次选举大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选举工作结束后,母亲被调到边区政府所属的延安专员公署民政科,专门负责接待上访人员。

1946年春,母亲又被调到边区政府民政厅一科工作,主要负责处理来往的信件和公函。不久,她与父亲结了婚,婚后被调到边区政府办公厅当秘书。

1946年6月,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紧急会议。母亲作为父亲的秘书,列席了这次会议。

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同时撤离延安。1947年4月,边区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对机构作了较大的精简和调整,并抽调了一批工作人员参加游击队。母亲坚决要求上前线,但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具体情况,没有批准。

1947年春,在转移途中,母亲的大女儿(我们的大姐)出生了,但不久便得了脑膜炎,夭折在马背上。

1948年5月,二女儿米拉在义合镇严家川的野战医院里出生。不久,传来了延安城被我军收复、边区政府已迁回延安的消息。母亲高兴万分,立即带着还不满两个月的米拉,雇了一头小毛驴,回到延安。

到延安后,由于父亲调到西北野战军任后勤司令员兼政委,组织上便安排母亲也到后勤司令部工作,仍然担任父亲的秘书。

1948年底,中共中央将父亲调回边区政府任代主席(接替林伯渠),母亲仍担任他的秘书。

1949年5月,父亲随同中共中央西北局进入西安城。同年8月,西安城匪患基本肃清,局势趋于平静以后,父亲把母亲和米拉接到西安。

1949年10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父亲担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并限期到任。于是,父亲和母亲带着米拉乘专列前往北京。途经河南时,母亲带着米拉绕道回家,探望阔别多年的父母、姑姑和姑父。听说姑父自日本投降以后便下落不明,可能已经客死他乡的消息后,母亲十分悲痛,特意去姑父的家乡临汝县(今汝州市)纸坊镇拜祭了一番。

到北京以后,组织上安排母亲担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的党组书记,协助父亲工作。

1950年11月,儿子都都出生。

1951年初,我们的姥姥(李福顺的夫人)去世,母亲便把她的父亲、姑姑和三个妹妹都接到了北京。父亲和姑姑由她供养,两个大妹妹也很快找到了工作。她把小妹妹带在身边,并安排在北京育才学校读书。

1954年春,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国务院监察部。父亲任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母亲在第二司任中级监察专员,主管秘书工作。

1955年5月,小女儿索拉出生。同年夏,受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的牵连,父亲被调到地质部任副部长。

1959年,监察部撤销,母亲被调到中国地质科学院任党委副书记。

六

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准备出一部关于刘志丹烈士的书,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工人出版社。工人出版社遂邀请母亲来执笔写这部书。他们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母亲都是理想的人选。

母亲不顾当时的政治压力和父亲等人的劝阻,毅然接受了这项创作任务。她对试图阻止她的习仲勋说:“我写这部《刘志丹》是决不会出问题的。即使出了问题,我文责自负,决不牵连你们!”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她的想法确实是太天真、太幼稚了。

1955年初,母亲开始有计划地采访。她在北京采访了曾经参加过西北土地革命战争的党、政、军干部数十人,并两次自费去陕西采访省、市(地)、县各级干部和群众百余人。她还实地考察了当年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主要地区,访问了在那里解甲归田的老红军和一些帮助过红军的群众,以增强自己的感性认识。历时七年,五易其稿,这部小说的上部终于在1962年夏完成了。

然而,在书还没来得及正式印刷出版,各大报刊正在争相连载之际,就有人给这部尚未问世的小说罗织了种种罪名。其中最大